

论黑格尔语言哲学的独特理论个性

杨兴凤

摘要 从语言哲学角度去考察黑格尔哲学会动摇一种常见的哲学信念:黑格尔哲学是以语言分析为主阵地的英美哲学所要拒绝的对象。实质上,黑格尔哲学中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论述,对其特征的阐明能够揭示出其与英美语言哲学传统不同的语言分析进路。让·依波利特甚至认为黑格尔把逻辑学建构为一种语言哲学,也有人主张黑格尔是真正实施罗蒂提出的“语言转向”的第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引入的辩证法语言具有整体主义与历史主义特征、运动承诺及模糊性与意义转换特征,这使得其语言哲学思想与英美语言哲学进路有着根本的差异。

关键词 黑格尔;语言哲学;辩证法语言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1-008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X080)

罗素、摩尔等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以拒绝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来重起哲学地基,“语言转向”的分析旗帜写满对黑格尔的批判辞。达米特把“语言转向”的开始点归给了弗雷格及罗素等人的工作。哲学史的著名整理者安东尼·肯尼也认为弗雷格使哲学转向语言哲学^[1](Pviii)。但越来越多关注语言哲学的研究者注意到,回到18-19世纪从赫尔德到洪堡的德国古典语言哲学传统,到延续至当下的发展系谱的刻画与阐明,可以让我们把“语言转向”的时间点推至弗雷格之前,并同时让我们看到德国语言哲学传统对当今语言哲学再出发、再定向具有的非凡意义。作为这一传统中的重要一员,黑格尔的语言哲学思想能够让我们窥见这一德国语言分析线索。黑格尔在诸多文本中进行的概念分析展示了丰富的语言哲学论述,这被依波利特的《逻辑与生存》(1953)这一文本的考察所确证,他甚至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建构为一种语言哲学^[2](P101)。依波利特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麦克卡姆伯在他关于黑格尔、语言与体系哲学的考察中主张:“黑格尔是一位语言学家,是第一位做出理查德·罗蒂所说的‘语言转向’的主要哲学家。他像维特根斯坦、摩尔、奥斯汀一样——甚至也像卡尔纳普、罗素和奎因一样——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造语言或更好地理解语言来解决。”^[3](P20)麦克卡姆伯甚至认为,戴维森、奎因和维特根斯坦是“某个更小议题中更成功的黑格尔”^[3](P28)。从20世纪中叶开始,对黑格尔语言观的研究已陆续展开,英美哲学界掀起了“黑格尔复兴”运动,并结出丰硕果实,布兰顿、麦克道威尔的新近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确证,罗蒂甚至认为塞拉斯和布兰顿的理论是黑格尔哲学的“语言分析化版本”^[4](P39)。

基于前述线索,现在的问题是:为何黑格尔自己没有创建专门的“语言哲学”来与他的艺术、宗教、政治、历史哲学形成相提并论的哲学陈述?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在对黑格尔文本中隐含的语言哲学进行系统刻画后才能得到回答,而先对其语言哲学思想的独特理论个性进行描述,将在重构“黑格尔语言哲学”工作中起到引论作用。

一、黑格尔语言哲学出场的曲折路径

黑格尔是自觉地将语言改造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任务的,这是所有关注黑格尔思想的研究者们难以忽视的一点。20世纪初开启“语言转向”浪潮之后,从语言哲学角度去理解和透视哲学经典文本就成为主流,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等文本自然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包括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依波利特、利科等都从不同角度提示了黑格尔的语言哲学思想。

语言哲学对黑格尔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新奇的东西。对一个熟悉哲学史的思想家来说,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以及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修辞学文献等关于语言思想的古典资源业已勾勒出语言在哲学思想活动中的专门性,黑格尔不可能不熟知这些资源;延续古代对语言的关注,一批近代论述者(霍布斯、洛克、孔狄亚克、休谟和卢梭等)更是将语言作为哲学的中心论题推到了有意进行哲学思考的头脑面前。到了黑格尔的时代,他的直接先辈赫尔德、哈曼、洪堡特已经奠定了德国古典语言哲学研究的地基并成为黑格尔直接继受的遗产。德国古典语言哲学传统的“语言育成世界观的存有论向度”与“语言对于行动沟通的规范性建制作用”两个思想维度,与20世纪初被称为“语言转向”的英美语言哲学有着非常不同的语言进路,而黑格尔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刻画及展开能够将这种不同揭示出来。

黑格尔虽未写出专门的语言哲学著作,但综观他的思想体系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得到他所持的哲学信念:哲学是语言的事业,通过重建哲学中的基本术语来重建理性概念,这是直面启蒙哲学的首要任务。黑格尔的语言哲学思想有一个大致的发展变化轨迹。

首先从谢林那里开始:对黑格尔进入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谢林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提出,哲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阐明存在于世界中的自我(“主体—客体”)和包含自我的世界(“客体—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现实性就是语言(“绝对主客体”)。黑格尔在耶拿时期(1804-1806年)的讲座及笔记中对语言的描述显然受到谢林的影响。他认为,从自然(客观性)过渡到精神(主体性)需要语言完成这一过渡的媒介作用,语言作为意识的第一潜能是具有双重性的动态“主体—客体”:一方面,语言是经验和思维的内在领域的外化存在,从而使精神具有客观性(即内在性的外化);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外在媒介能够使意识通过它而把握自然的外在领域,并将其占为己有(即外在性的内化)。在这里,黑格尔并没有先验地考虑语言,也没有对语言产生元批判的怀疑。语言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具体的总体”,它由符号和名称组成:符号是抽象的语言结构的形式元素;名称是特定的和单一的语言元素,在“命名”过程中提供意识与对象的联系从而使其具有特定内容(符号指向概念,名称指向经验对象)。与谢林哲学的决裂使黑格尔认为,作为预先存在的“主体—客体”的设定(是抽象的、内部不确定的语言对应物)不足以满足科学方法的复杂性,因为精神发展的每一个特定阶段都得证明“实体本质上是主体”,从而提供通向科学立场的阶梯。这种不满足使黑格尔的语言思想推进到《精神现象学》中需要对语言的“述行”(performative)之“生命力”维度进行深入考察。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可被当作黑格尔的下一部作品《逻辑学》的“语言学导论”来读。黑格尔用“思辨命题”来表述语言本身具有的否定性辩证结构(语言发生时是一个辩证运动)。这与纯粹形式的逻辑在知性作用下作出区别并把其固定起来的传统逻辑不同。伽达默尔就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中强调,黑格尔注重的思辨句与传统判断逻辑陈述句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5]。黑格尔反对传统逻辑的这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认为其基本判断命题“S是P”中当S和P被实际的词代替的时候,就会显现出主词并不像形式连接词“是”所断言的那样简单地与客体同一,两者实质上是处于一种内在复杂的关系中,既包括差别、中介,又包括同一性。据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发展的思辨逻辑是概念本身在句子中流畅而具体的运动时所遵循的逻辑,它是将真理嵌入具体语言中的表达过程,同时也是将真理从概念中解放出来的行动。

在《精神现象学》阶段,黑格尔通过强调语言的“述行”(performative)性所具有的介入现实、塑造现实的功能,使语言不但具有运动连续性机制,而且具有了社会物质性内容。黑格尔在这一阶段还强调了语言作为精神的存在,它是为他人而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揭示了自我的“真理”从而超越自我意识范围而转化为普遍精神的必要性,这被后来的实用主义与匹兹堡学派揭示为黑格尔哲学关于规范的“社会性”维度,并且更具体地在对黑格尔的承认概念的挖掘中揭示其启示性。

时间推进到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写了两篇关于哈曼和洪堡思想的长篇评论,他对赫尔德、哈曼、洪堡以及元批判概念的熟悉使他不再只是将语言看作其哲学事业中一个泛化渗透的主题,而是需要在其哲学体系中拥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他在《哲学百科全书》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观精神”中,赋予语言以系统的地位。在这里,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第一,将语言明确降级在主观精神范畴内,而不是之前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第二,在《哲学百科全书》的“主观精神”的“精神现象学”部分,语言并没有作为一个明确的主题,与之前阶段的《精神现象学》里赋予语言作为“逻辑学”的“语言哲学导论”地位不同;第三,与早期语言作为具体整体的观念不同,黑格尔将之前的语言运作之“直观”“表象”与“思维”重新区分表述为“前语言”的感官图像——表象的“先验语法”——“后语言”的概念活动三个不同环节,并在表象环节进行的先验分析中强调了从直观到思维的转变与之前的语言进路的不同。

上述对黑格尔语言思想的发展阶段的回溯性刻画让我们看到,黑格尔在《哲学百科全书》中对语言的处理与他早期著作不同,这种不同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黑格尔以“直觉(感官图像)—回想(心理图像)—再生想象力(抽象表象)—联想想象力(符号)—创造符号的想象(词与言)—回忆(名称)”的语言(思维)发生过程描述了语言的产生、要素、意义等主题,这比早期的语言思想更为集中系统。其次,黑格尔重新思考了符号与名称之间的区别,并认为名称在概念思维的形成中起到奠基作用。再次,黑格尔淡化了早期关于语言的以下几个重要主题:语言的述行性问题,思辨命题作为辩证法思维运动的表达的问题。

通过追溯黑格尔关于语言的思想观点,回到最初的问题:黑格尔为何没有专门的语言哲学著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试着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黑格尔关于语言的观点与哲学方法具有了非一贯性,这与他要完成一种“有机整体”的哲学追求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对黑格尔而言,哲学本身就是语言的事业,哲学观点的展开就是语言本身的运行,所以,“未写出的语言哲学”已经写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了。

二、黑格尔语言哲学的思想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语言转向”是对哲学史上神秘主义的反映。20世纪初兴起的分析哲学就是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句法分析来克服传统意识哲学幽暗性的努力,语言和逻辑成为界定语言哲学的核心特征。黑格尔逻辑学的展开实质上就是一个语言分析的程序,这与20世纪初“语言转向”思潮的推进者们的工作思路是相似的。对黑格尔哲学持这种新读法的研究者认为,与卡尔纳普和艾耶尔对黑格尔的激烈批判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明确的、高度自觉的语言澄清与修正程序,贯穿这个程序的总策略是引入辩证法语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就对黑格尔的这种策略进行了确证:“当黑格尔提出要融化和精制抽象的思想规定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把逻辑学融化于语言的程序(Vollzugsform)中,把概念融化于进行问和答的语词的意义力量之中——这是对于辩证法过去和现在究竟是什么的一个不成功的伟大提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的独白,它想先行地完成那种在每一次真正谈话中逐渐成熟的东西。”^[6](P522)

黑格尔引入辩证法语言的策略使他的哲学体系产生了两个确定性的特征:首先,辩证法的逻辑运动是用思辨哲学的“新”语言来表达的;其次,辩证法的语言表达导致黑格尔建立了思维的社会历史特征^[7]

(P62)。这两个方面使黑格尔的语言哲学遵循以下两个方面的信条。

第一,遵循哲学逻辑化的传统,但将传统的形式逻辑改造为辩证逻辑。亚里士多德为了建构逻辑公理化的知识系统,早已采取了语言分析的进路。亚氏在《范畴篇》《解释篇》中论述的逻辑三段论式演绎性知识是由具有主谓结构的命题来陈述的,哲学命题表现为谓项列在主词之后,对作为基础的主词进行述谓。按黑格尔的分析,这是康德以前独断形而上学表现出来的思维逻辑,即坚固不变的实体在一边,思维在另一边,认知的发生就是思维对实体进行表象,同时又以“S是P”的形式思维产生论断。黑格尔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关于理智对象的观点,思辨哲学不应以谓词形式来说话,因为表象思维“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而形式思维“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否定地对待所认识的内容,善于驳斥和消灭这种内容”^[8](P45)。在黑格尔的分析中,只有概念思维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在其中,“概念是对象所本有的自身,而这个自身又呈现为对象的形成运动,所以对象的自身不是一个静止的、不动的、负荷着偶性的主体,而是自己运动着的并且将它自己的规定收回于其自身的那种概念”^[8](P46)。概念思维是以思辨命题来进行表述的。伽达默尔在对黑格尔采取的思辨命题进行分析时指出,哲学命题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把一个谓项列在主词概念后面,然后从主词概念转移到另一个与之发生关联的概念,而是以谓词的形式讲出主词的真理,也即,思辨命题并不陈述某物具有什么,而是把概念的统一性表述出来^[6](P656)。

黑格尔诊断出传统思维逻辑及其相应的语言命题的缺陷:一方面,传统逻辑拘泥于一种主谓结构的命题来表述知识,在这种结构中,一个主词被设定为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上附加着各种各样的属性(宾词)或谓词;另一方面,概念被设定为对一个静止的、不动的、负荷着偶性的对象的描述。这两方面的“病症”需要思辨命题来治疗。思辨命题是同一命题,它遵循辩证思维,“思维既在宾词中被抛回于主体,又同样丧失了它在主体曾经具有的那个坚固的对象性的基础;并且宾词中思维不是回到自身,而是回到内容的主体”^[8](P48-49)。思辨命题中,主词与宾词的同一并没有消灭它们的差别,而是表现为两者的动态和谐。黑格尔认为,命题表述的真理是辩证运动^[8](P50),命题的要素(概念、判断、推理等)只能在逻辑学自身之内得到澄清。

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首先是对康德先验逻辑的超越。康德对科学知识的严格必然性的先验论证是黑格尔首要批判的对象。“辩证的必然性不再是形式的必然性,而是历史化的、实用的、最终是实践的、社会的必然性。”^[7](P5)辩证逻辑在语言问题中解决了两个统一:

首先,在辩证逻辑中,普遍性和个别性通过语言统一起来,命题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逻辑呈现。因为语言是思想的作品,凡是语言说出的都是普遍的^[9](P53)。又因为当个别的、感性的“这里”“这时”“这一个”被说出时,就是诸多的“这里”“这时”“这一个”构成的普遍运动(作为共相的“这里”“这时”“这一个”),它们是意识范围内的事,是包含着否定性、差别性、多样性的知觉规定性,成为语言里的一般。“我所说出的,永远仅仅是一般的東西或共相”^[8](P82)。黑格尔认为,语言的神圣性质就是把个别的東西转变成共相,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转变,就是因为思维遵循的是一个辩证运动。

其次,在辩证逻辑下,内在性和外在性通过语音统一起来。在黑格尔那里,语言的本质是“说出来”,所以语音是语言的基本层面^②。黑格尔认为,考察语音在人类语言中的作用应当按照辩证逻辑的方法,这就不能将语音只是视为一个物质性发声器官产生的振动。“清晰发音的语言是人如何摆脱其内部感受的最高方式”^[10](P116)。语音以非物质性的形体性保持着内在性品格,使观念性获得与其相称的外在实在性,并在传播时又被取消其实在性。在辩证逻辑的思维中,对语言结构中的语音的理解还会进一步将

① 黑格尔还对辩证性和思辨性作了区别,辩证法就是思辨性的表达(Ausdruck),是真正存在于思辨性中的东西的表现(Darstellung),因而也就是“真正的”思辨性^[6](P658)。

② 德里达就论述了黑格尔将言语置于写作之上,并认为这对于黑格尔完成其目的论至关重要。

语言起源的实质(主体性,我思)以一种比康德^①更精巧的方式显现出来,即表述为思维规定(Denkbestimmung)。在这种思维规定里,主观的东西和客观东西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消除了。因为清晰发音的语言使感受进入语词,在其中,思维对对象的规定性得到完成。语言“说出来”(语音)像所有的运动一样,是身体在时间中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身体的空间性的扬弃(它宣示自己是主观的、内在的,是心灵指向的东西)。通过上述论述,黑格尔让我们看到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语言问题上的不同运转路径,这种深刻的差异预示了20世纪初弗雷格、罗素等人形式语义学的命运,也预示了20世纪50年代后分析哲学运动中奎因、戴维森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的主体转变。

第二,遵循“思维—语言—存在”一体的语言哲学观,预示了后来语言哲学的主题与发展趋势。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核心就在于突出语言、符号对认知的核心作用,据此解决传统哲学“心灵—世界”的二元结构困难。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显然是自柏拉图‘逃入逻各斯’(Flucht in die Logoi)以来希腊形而上学发展关于存在的思想所依据的主线”^[61](P642)。黑格尔延续这条主线并早就走在了语言分析的路径上。他认为,思维的逻辑运动是跟随语言的踪迹^②而呈现出来的,“我们正是用名称进行思维”^[10](P287)。语言自身的客观实在性意味着,思维既不是康德式“我思”的先验功能机制,也不是主体性或意识的心理学。黑格尔逻辑学的目的,就是要对思想规定的整体性进行展开,它需要借助辩证法把意义连续统(das Sinnkontinuum)实现于语言程序(Vollzugsform)之中。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先验性之预设进行批判,通过将理性依赖于语言(概念运动过程)展示出来,坚持赫尔德和洪堡所坚持的思维与语言的一致性原则,并使这个原则在他这里得到更为逻辑化的实现。对此《逻辑学》中是这样表述的:“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里。人兽之别就由于思想,这句话在今天仍须常常记住。语言渗透了成为人的内在的东西,渗透了成为一般观念的东西,即渗透了人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而人用以造成语言和在语言中所表现的东西,无论较为隐蔽、较为混杂或已经很明显,总包含着一个范畴;逻辑的东西对人是那么自然,或者不如说它就是人的特有本性自身。”^[11](P7-8)黑格尔据此提醒我们,在对“逻各斯”的理解中,应当首先意识到逻辑具有的“语言本能”——说出来。逻辑形式的客观性可视作思维的“实在”,它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是一个表达的过程(Äusserung)。这种客观性的内容以精神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呈现出来,其可见性、可分析性、事实性存在于语言中。所以,对逻辑的分析必然要求对语言进行分析。黑格尔遵循了哲学逻辑化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莱布尼茨和康德那里已具有现代形态。黑格尔将康德的先验逻辑改造成内容逻辑^③,就像康德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形式逻辑改造成先验逻辑一样,这种改造的任务就是使僵化的、固定的逻辑运动起来^[12](P42)。

黑格尔以辩证逻辑将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通过概念的构成运动显示出来,这就将思维、存在、语言三者的一体性完成了勾连。他首先肯定了世界的共同性是语言的前提^④,接着对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关系的二元式表征语言进行了批判。以“存在”和“无”这两个概念在传统哲学中的表征性使用为例,黑格尔指出,“存在”“无”“转变”并不是如表征语言那样指向语言外的任何实体或基底,它们只是自反式地回到纯粹的语言中,恢复语言的思辨意义。表征语言需要假设对象或基底(也就是必然预先假定实体)以使命题具有真值,术语的同一性是由它们指称的对象或基底所限制,这就排除了“转变”(becoming)。黑格尔认为,逻辑语言不是关于语言外的事实,它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在旧的思维结

① 黑格尔批评康德在表达“我思”时使用了一个笨拙的表述(即我伴随着我的全部表象)^[10](P54)。

② 就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表述的那样,“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是黑格尔遵循的希腊以来的传统,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承认“思维不能发生在语言之外”^[11](P7)。

③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分析“这一个”语词的指示成功暗示了语词(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指称关系的东西,而是引导人们进入一个语境空间的通道,在其中引发概念系统的运动,将语词意义与经验知识链接起来,从而使语词、事物、意义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在黑格尔的分析中,语言并不是直接与对象形成明确的指称关系的。

④ 黑格尔并不如20世纪初期分析哲学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的那样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罗伯特·布兰顿的“世界的可答复性”的说法是在黑格尔的这个思路上来论述的。

构中使用“存在”和“无”的概念,会导致哲学思维陷入困境;只有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分析即抛弃指称性的表征语言,恢复语言的“思辨意义”,才能使“存在和无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命题成立。因为“存在是向着无的过渡,无是向着存在的过渡”将“转变”这个“第一个概念”的内涵确立起来。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语言是克服主客分裂方案的最佳范本:在语言里,精神占有了外在性,主观的可以是客观的;语言是“完善的元素,内在性是外在的,就像外在性是内在的一样”^[13](P439)。据此,语言的分析就是精神的分析,语词符号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是一个有机系统,是精神的积极自我生产过程,绝对精神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过程。黑格尔要表达的是,绝对精神是我们所有人积极参与意义表达的一个真实过程,这种终极统一实质上呈现的是多元的、对话的、人际间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过程^[14](P297)。

从根本上来说,黑格尔引入辩证法语言产生的后效是将哲学从其传统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路径扭转到更为运动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的路径上来^[7](P97)。最近几年,英美分析哲学界的“黑格尔复兴”运动集中关注的就是黑格尔的意义语境主义观点以及他关于语言作为精神产物的历史性质的观点。

三、黑格尔语言哲学的总体特征

引入辩证法语言使黑格尔语言哲学的进路决定性地不同于英美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换言之,辩证法语言的总体特征就是黑格尔语言哲学区别于英美语言哲学传统的标识特征。借助于如下总体特征的指引,能够让我们清晰看到两种语言哲学进路的差异所在。

(一) 整体主义与历史主义

认识论的整体主义是当代分析哲学的核心见解之一,它与历史主义会以一种交缠的方式呈现出下面向:一是奎因式的观点,即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其宿命;二是一种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生活形式有关的、对知识主张的“社会”论证;三是与历史的情境关联在一起的认识形式与认识结论。

整体论对认知发生的原初“所予”的拒绝再次使逻辑原子主义遭受致命打击,因为“对非概念的纯粹感官材料的拒绝”与“概念之间是以推论关系整体存在”两种主张是一体的,此外还引出了“认知者参与概念运用关系的语用转向”这一核心主张。当代分析哲学的上述三种基本见解标识出了“黑格尔在英美分析哲学中的回归”或“黑格尔复兴”的真正实质所在。在匹兹堡的“黑格尔主义者”麦克道威尔的研究中,黑格尔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知识建立在一种深刻而普遍的社会历史层面上。布兰顿的《使之清晰》将我们引向自我意识的社会背景,这代表了一种弥合内容与形式鸿沟的推论语义学的尝试^[15](P361)。布兰顿直言,他的方案是黑格尔式的。对黑格尔来说,概念的意义来自人的有意义行动,因而认识论的主张和规范性的承诺是密切相关的^[16](P20)。而规范性是一种社会成就,语言意义的赋义主体和赋义机制只能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就。就像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主张的,要讨论“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描述之世界”是困难的,我们不能赤裸裸地获得现实。离开哈贝马斯的困难,回到黑格尔,他将我们引向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维度的考察:个体并不是思想独立的,思维基点的概念(“有”“无”……)是个人与他在某个历史时刻合力产生的,即认识的非历史的立场是不可能的。

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语言的内容语料与形式模式之间作出区分。形式化的语言将哲学问题仅是处理成元语言的,并且回避谈论事物及事物与我们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形式化的语言取消了人与对象或事件的证据性的或信息化的关联,而这些是他们产生信念和拥有知识的对象。将命题与世界分离的方式导致了概念图式的相对性^[17](P74)。回到黑格尔那里,他致力于阐述一种知识与世界的连续性以及这种或那种知识与我们所知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方案,这种方案不会陷入“形式化的语言空转”中。黑格尔认为,我们的经验是一套既关涉概念也关涉我们用概念去把握世界的活动机制(function)。经验是我们通达世界的通道,根植于世界;同时它也受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怎样使用概念的限制。这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它并不要求走出概念图式,但又绝不仅仅是概念图式自身的问题。哈贝马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业已提示了他受赠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信条:

避免意识范畴的谬误的方法,就是要充分借用社会历史框架的震荡带来的规范作用。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去直接获得赤裸的现实是不可能的。布兰顿的推论语义学与哈贝马斯对话理论揭示出命题陈述的有效性取决于说话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伦理式承诺。两者都意识到,黑格尔的认识论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丰厚资源,他的哲学最终要揭示的就是社会历史问题是话语规范性的根本问题。黑格尔现象学的一系列扬弃就是将自我意识这个精神运动的参照点放置在某个历史时刻与其他自我意识合力产生的结果,它同时也是对先天基础主义的一种反对和清理。另外,古典实用主义将传统哲学的真理问题转换成“如何认定其为真”的“制造真”的活动,这种情境主义的知识论主张的思路是黑格尔式的:首先,它反对表征主义立场;其次,它主张一种知识的动态主义;再次,它主张情境化的认知方案。

黑格尔的逻辑学向我们讲述的就是概念的整体关系,即以概念的推理关系来考察概念,一种理解方式以另一种理解方式为前提,概念本身就是理解本身的整体运动。就如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从“a现在是红色的”引出“a现在不是绿色的”,可以表明基本命题不是相互独立的。概念之间的推理关系是本质的,即使是表明感知性质的观察谓词也只能通过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而得到界定。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中介(Vermittlung)才能使概念的意义得到确定。塞拉斯、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正是从这点发展出语义整体论。掌握概念就是知道它们涉及的推理和不兼容的方法^[18](P89)。“黑格尔的现象学,是推理主义的,即使是非推理的报告也必须通过推理来表达”^[19](P47)。《逻辑学》中的思维进展步骤就是从概念下的具体个体的名称(比如苏格拉底,一个具体的人)到包含着这个具体个体的概念(人的概念)的转变。某物是实在的,但这个某物是非常浅薄的确定。思辨逻辑是通过“t1 is (the) t2”[der (die, das) t1 ist der (die, das) t2]这种表达式来阐明特定范畴的内涵内容,据此而推理地阐明概念术语的意义,形成概念的联系之网:对于t1概念的解释需要联系t2概念来进行,直至概念的本质回归到存在自身时,我们就获得了对概念本质的部分确定。

黑格尔的辩证法语言是思维和存在同一原则的语言化表达,它遵循的是一种既有形式也有内容的整体主义思路。《精神现象学》中“感性确定性”的“这一个”已设定存在维度通过语言的意指关系而揭示出来。被黑格尔所称的语言的神圣性质使直观的东西提升为普遍的知识,且在意识共同体的相互承认活动中将个体独特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这就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就如依波利特的分析那样,在黑格尔那里,“经验和逻辑并不是互相对立的。经验的话语和逻辑的话语作为后验的和先验的,互相对应并互为条件。不设定绝对知识就不会有可能经验,但是经验的路径指向绝对知识”,“这种绝对知识是辩证法话语内在所固有的理智直觉,辩证法话语在语言中是特定的思想和思维的统一性,而思维只有在这些特定的思想中固定自己,在这些规定中停留,以便深入它们,观察它们的变化,才会把自己具体化。在这种话语中,存在自身反映自身,并将自身阐述为可理解的话语”^[20](P36)。《精神现象学》关于“感性确定性”的分析中贯彻的就是这种存在与思维同一的整体主义语言思想路径。黑格尔指出,只有当我们理解某个个体的时空条件及进行恰当的实指动作时,我们才能将个体特定化从而获得感性确定性,而这个过程的分析表明了人类知识中感性材料和概念性的理解是相互依存的。

黑格尔以“众心一致”来描述语言精神,这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体现。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表述,当我们读到一个词并领会它的意义时,我们的心灵就相遇了,这就是“众心一致”。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逻辑学》中对此的解释是:“众心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权威,而且人们很容易从“一个内容在所有人的意识里都能够被发现”这个观点过渡到另一个观点,即“这个内容包含在意识自身的本性里,并且必然属于意识”,对意识本性的研究会导致“普遍同意”^[21](P129)。黑格尔在这里表述的是语言意义的社会性来源问题(这隐含着世界对认识者而言的共同限制)。黑格尔以“众心一致”的语言精神实质上为以后语言哲学以“集体意向性”来解释语言意义问题提供了思路。当代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主张“语言和意义社会建构论”(SCLM)所持的核心观点就是黑格尔式的社会历史语义学思路。伯奇作为这一派的典型代表就认为,个人习语的意义必须以非个体主义的方式被确定^[22](P275-290)。这种思路与形式语义

学主张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关系的语言哲学二元进路非常不同。语言并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式系统自动地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23](P131)。而且,“黑格尔并不信任意识的个体性表达,尽管个体性意识处于理论意识发展的整体链条中,但他关注的不是任何独立的个体性意识,而是由教育带来的意识何以能够获得属于理性逻辑空间的自发性概念的能力,这一自发性概念只有在语言文化共同体或‘伦理生活’的学习中才能习得”^[24](P61)。

(二) 运动承诺

黑格尔首先区分了我们认识某物的能力和我们从某物中“获得概念意义”的能力。对黑格尔来说,这个区分的关键作用是凸显一个问题意识,即真正理解某个概念性的主张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因为这关涉将传统的静态知识论转变为一种对知识的历史的、发展的规范性解释。

黑格尔早期哲学中的“和解理性(爱)”主题早已预示了他的哲学追求:对运动、有机统一体的哲学理念的追求。他在《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中就把“变”“生命”作为自己的哲学关键词提示出来:“哲学的任务在于把这些前提结合起来,把存在置于非存在之中作为变,把分裂置入绝对物之中作为绝对物的现象,把有限置入无限之中作为生命。”^[25](P12)他的这种哲学追求首先遇到了将“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等范畴对立起来的表征语言,这是一座统治思想界已久且顽固的障碍,它体现的是一种分裂。在黑格尔那里,表征语言首先预先假定有一个表征对象作为“基底”,其次,其默认了静态的概念结构。表征语言同知性思维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作出区别并把区别的各要素固定起来。而辩证法隐含着连续性的原则。黑格尔在《逻辑学》开头所做的“有——无——变”语言概念的辩证修正成为以后一切概念运动的基本模式。对黑格尔而言,概念就是这个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语言事件,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移动的,它们的整体就是精神。精神在其本质上是对话的、人际的、社会的、历史的^[14](P296)。在不同语境中的重复持存了语言的连续性,意义就是在这种连续性中被固定的。然而,意义的限定必须放置在对话链的结束时才会暂时完成,所以,意义是动态性的东西。黑格尔在解释意义时,不是像伽达默尔一样将人类的有限经验作为内容,而是将有限之物的思想放置在逻辑学中来考察,得出概念会在逻辑上扬弃自己趋于真无限的结论。

黑格尔辩证法中最重要的语义思想是通过排他的模态限定关系来确定概念,这是对其辩证法否定性结构的语义阐释。根据他的观点,世界的规定性即事物属性的归属是通过谓词表达的,而一切规定都是否定:某物具有P1属性,只有当它排除了具有另一种属性P2时成立。否定的运动使辩证法语言成为语言修正的程序理论。辩证法是黑格尔的哲学语言为了真正解决新问题而作改变的过程^[7](P66),它是阐明一个命题的语言含义发展的过程,包含着对概念分析的运动承诺。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为了让抽象的概念得到理解,把概念转化回词的意义生成及进展过程,这个过程把概念融化成对词的意义追索:它是一次次的询问和回答,是一种回忆(Erinnerung),是对事物的表象与规定,是心灵从一事件转移到另一事件的关系与过程,也是将自我意识引向主体性及承认关系中的协调运动。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最终以逻辑代替了语言,但伽达默尔没有注意到的是,黑格尔关于语言中的“逻辑本能”发展出的“辩证逻辑”已不再像传统逻辑那样是对语言的抽象,而是深刻地浸染了语言的结构,恰恰体现了语言最本质的运动^[26](P105)。

(三) 模糊性与意义转换

对弗雷格和罗素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语言的模糊性就是逻辑灾难。弗雷格正是基于概念定义的精确性而预备设计一种理想语言,这种严格的语言直接把模糊性当作大敌。不唯弗雷格,对20世纪初不同流派的语言哲学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都被视作形而上学神秘性的例子。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一个程序,它的运动构建了一个序列,语词在这个序列中流动和停留指认。这个程序需要容纳模糊性并使其在确定语词的意义过程中发挥作用。逻辑和历史是黑格尔辩证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在他的语言哲学中逻辑表现为语言结构,历史表现为语言内容,则必然使语言表现为一个连续的、有机的生长

机制。这个语言有机体将会具有模糊性与意义转换的动态性作为生长的环节。

黑格尔辩证法语言的两个关键特征即语言意义的模糊性和意义转换与黑格尔语言哲学的另外两个主张即“意义的语境主义观点”和“语言作为精神产物的历史性特征”紧密相联^①。它们的联系表现为两条驱动机制:其一,作为辩证法核心的矛盾运动依赖于模糊性带来的弹性动力;其二,意义转换是使思维通过在运动中捕获来自不同历史情状中的变化动能的过程。这种联系从本质上来说,与黑格尔哲学关于思维具有历史性质相关。正是黑格尔对必然性的辩证历史化——或者承认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偶然性的力量——开辟了后续哲学的富有成效的道路,尤其是产生了具有广泛渗透性的实用主义思路^[7](P5-6)。模糊性一方面有语义不完全性的缘由,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术语对上下文依赖从而在使用中具有震荡性特征。

对黑格尔来说,语言的模糊性与语言总是处于使用过程中而产生“动与变”的连续性相关,这对处于行动的、进化的、历史的、解释学视域中的东西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模糊性构造了语言的一种开放结构与生长机制。每一个确定的概念都不是静止的,比如“真朋友”就是“其行为方式符合友谊概念的人”——“真朋友”的概念是鲜活的、不断发展的理解,它有一个行为内容多样的未穷尽状态,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因而是确定无疑的具体行为就规定了“真朋友”这个概念的全部。模糊性指的是一种边缘和“之间”(中介)状况,黑格尔举了种子何时才不再是种子而变成植物的例子。在这种边缘状况,谓词是否适用是不确定的。这种含有不确定性的模糊谓词还会表现为沙堆悖论(sorites paradox),即从一堆沙中一粒粒地减去的过程,从什么时候起不再算是一堆沙。辩证法是过程和转化的逻辑,因此,它比其他理论都更适合解释语言的模糊性。在黑格尔那里,即使到了绝对理念,仍然不能消除模糊性,并且正相反,绝对理念的完整性恰恰需要模糊性作为其环节。

辩证法对模糊性施加了限度和根本约束,从而化解了对其激进的、解构性的滥用。这个限度和根本约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世界的存在,二是语言和理性的社会历史本质。第一个方面,罗素等人曾错误地攻击黑格尔否定外部世界,实质上,黑格尔只是要表明,绕过思维而直接接触实在、并获得实在的感官材料是不可能的(这被塞拉斯视为反对原初所予的盟友)。我们只能在思维逻辑(概念图式)中表述世界。但黑格尔并不试图像后来的自然科学一样论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对我们的认知构成的直接限制,也不像康德那样以幽暗坚固的物自体来限制经验的可能范围。他采取的是通过概念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整体同一性将知识与自然联系起来,并通过理性的社会、历史性本质来为知识注入内容。模糊性在这两个限度中活动从而为辩证法的运转提供动能,它防止了表征思维“复刻”世界的僵死性。第二个方面,语言与理性的社会历史本质,是黑格尔哲学的最决定性贡献。它阐明了知识的规范特性,也说明了“我们”代表的客观性对“我”的限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容纳模糊性与意义转换生成,绝不是让语言概念与命题陈述流于一种任意关系,在《哲学百科全书》中,他就仔细论述了符号与符号对象、指称规则对语言运转的必要性。指称对黑格尔来说是有着双重中介结构的:一方面,它以概念为中介;另一方面它以历史为中介。展开来说,即一个词首先由于概念的描述而获得意义,其次由于产生这个词的“变形”或变化史而获得意义^[7](P8)。逻辑和历史是黑格尔辩证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语言是逻辑和历史的中介纽带,逻辑将客观思想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思想与语言的历史本质以逻辑的动态过程方式得到呈现。

四、结论

对黑格尔来说,语言、思维、逻辑、辩证法是一个关联体,我们不能绕过语言去思维。通过这个关联

^① 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一道,并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论确定性》中的主张一起,事实上已经承认并接受黑格尔式的语境主义(即知识是在语境中被证明的,因为它们的真理是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为真理和意义提供了背景条件)^[7](P62)。

体的呈现,黑格尔既要完成一种逻辑阐明,又要完成一种思维过程的呈现,并且揭示人类知识的社会历史运动性。黑格尔认为,日常语言中所遵循的自然逻辑“无意识地忙于”语言和思想的范畴,只有思辨逻辑才能够把自然语言中暗含的理论承诺明确地表达出来,并据此提高心灵的自由,所以他引入辩证法语言、用思辨语句来揭示出精神的真正的秘密。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黑格尔的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路,这些见解在当今的语言哲学发展中正在得到回应。譬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感性确定性”的诊断性分析就呈现了认识世界的各种模型,这对当代英美哲学的许多核心问题提供了理论启示。甚至可以说,黑格尔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对“所予神话”的批判工作。而且,黑格尔与早期分析哲学核心问题上的理论关系也是可以重新考察界定的,比如罗素将知识建立在感觉材料上的“亲知”的分析模式,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意识”部分的三章中已经有了“预测性”的分析。

对黑格尔语言哲学的考察,让我们重新思考“语言转向”的发生时间点及表现形态的丰富度。这也提示了当下分析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之缘由所在。无论是平卡德、匹兹堡学派还是哈贝马斯,他们对黑格尔哲学中“社会建构”的兴趣与分析哲学所经历的语用转向是相关的。就如平卡德指出的那样:“所有各种各样的推理活动——例如,告诉某人你为什么认为某种信仰是合理的[……],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相互评价彼此的行为;在这种形式中,我们每个人都承担一定类型的认知和伦理责任;在这种形式中,我们根据他人的行为,将一定的道德和认知责任归于他人。在各种涉及推理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也有批判的原则来评价我们所给出的理由。也就是说,推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在一种确定的‘社会空间’形式中进行。”^[27](P7-8)平卡德在此道出了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复活的原因:黑格尔在社会历史空间中找到了规范性来源的真正说明,并以一种动态的进化结构来说明人类精神的运作机制。这给当代分析哲学在“语言与真”问题上提供了真正的思路。

20世纪的分析哲学将语言推向哲学的中心,意欲在哲学中以遵循逻辑语法规则的形式语言来替换自然语言在哲学中的表达,但这种“指称—涵义”范式的形式语言无法考虑说话者的意图,忽视了语言是在互动过程中出现的,而且并不存在孤立的命题这样的事实。皮尔斯的三元性符号理论引领的语用转向确认了一个基本事实: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交往的共同体中才能被理解,符号的使用者(解释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皮尔斯到阿佩尔及哈贝马斯都承认关于世界的理解应当在共同体的语言活动中进行协调。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明确提示这条思路。对他们而言,“世界”这个概念是在语言上的、被不断解释着的、充满着行动意向的、并因此是历史的。谈论世界,就是反思我们自己(布兰顿就宣称“我们”是《使之清晰》的主题)。在此思路下,语言不再是表征的器官,而是说话者的生命形式。这些也是布兰顿宣称他的方案是黑格尔式的缘由。

参考文献

- [1] Anthony Kenny. *Frege*. London: Penguin, 1995.
- [2] 王赛. 存在的话语:伊波利特对黑格尔语言哲学的建构. 哲学动态, 2022, (6).
- [3] John McCumber. *Company of Words: Hegel, Language and Systematic Philosoph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K. Vieweg, W. Welsch. *Das Interesse des Denkens—Hegel aus Heutiger Sicht*. München: Fink, 2003.
- [5] Hans-Georg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6]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 [7] Angelica Nuzzo. *Hegel and the Analytic Tradition*.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 [8]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 [9] 黑格尔. 哲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 先刚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 [10] 黑格尔. 精神哲学——哲学百科全书·第三部分. 杨祖陶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11] 黑格尔. 逻辑学: 上卷. 杨一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6.
- [12] Nikolay Milkov.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Germ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 [13] A.V. Miller.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4] Theodore Geraets. Hegel's Articulation of Meaning. *Hegel-Jahrbuch*, 2015.
- [15] Tom Rockmore.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Hegelian Tur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001, 55(2).
- [16] Norman Schultz. *Semantic Realism and Historicity: Brandom, Habermas and Hegel*.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2018.
- [17] Kenneth R. Westphal. *Hegel's Epistemology: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18] 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 Robert B.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0] Jean Hyppolite. *Logic and Existence*. New Hav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 [21] 黑格尔著作集: 第 8 卷. 先刚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2] Cf. Tyler Burge. *Foundations of Mind: Philosophical Essays: vol.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 [23] 陈波. 语言和社会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10).
- [24] 王增福. 论麦克道尔对康德哲学的黑格尔式超越.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 (6).
- [25] 黑格尔. 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 宋祖良、程志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26] 李钧. 语言是逻辑的本能: 黑格尔语言观再思考.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 [27] Terry Pinkard. *Hegel's Phenomenology—The Sociality of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On the Uniqu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gel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Yang Xingfeng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 A study of Hegel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ould undermine the authority of a common philosophical belief: Hegelian philosophy is incompatible with analytical philosophy dominant in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that emphasizes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fact, Hegelian philosophy contains rich ideas of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an illustration of it will reveal a very different approach to language analysis from the tradition of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Jean Hyppolite even believes that Hegel constructs logic as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ome argue that Hegel is the first philosopher to accomplish a Rorty's "linguistic turn". The dialectic language introduced by Hegel, with its holism and historicism, movement commitment, fuzziness and meaning transformation, makes it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 of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Key words Hege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dialectic language

-
- 作者简介 杨兴凤,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广西 南宁 530004。
■ 责任编辑 涂文迁